

# 西方史学的开拓与创新

庆贺张广智先生八十华诞暨从教五十年论文集



本书编委会 编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方史学的开拓与创新:庆贺张广智先生八十华诞暨从教五十年论文集/《西方史学的开拓与创新:庆贺张广智先生八十华诞暨从教五十年论文集》编委会编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21. 1

ISBN 978-7-309-15216-6

I. ①西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史学理论-西方国家-文集 IV. ①K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0)第134751号

西方史学的开拓与创新:庆贺张广智先生八十华诞暨从教五十年论文集

《西方史学的开拓与创新:庆贺张广智先生八十华诞暨从教五十年论文集》编委会 编  
责任编辑/关春巧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 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 86-21-65102580 团体订购: 86-21-65104505

外埠邮购: 86-21-65642846 出版部电话: 86-21-65642845

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25 字数 382 千

202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15216-6/K·733

定价: 150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编委会

郭长刚 吴晓群 王建娥

陈 新 陈 恒 李 勇

梁民慷 周 兵 肖 超



张广智先生近影



耿淡如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合影（2018年3月）



张广智先生与夫人蔡幼纹女士



张广智先生与首届博士研究生郭长刚



张广智先生与首届博士研究生吴晓群



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（2008年5月）



张广智先生与部分学生合影



《西方史学通史》（六卷本）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合影（2012年3月）



张广智先生与部分学生合影（2018年3月）

# 八十自述(代序)

张广智

岁月荏苒,真是日月如梭,不知不觉吾已行年八十有余,渐入老境矣。八十年了,于时代、于国家而言,历经新旧中国两重天,又跨越世纪换新颜,改革开放再出发,当然是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了;但回顾个人的经历,却是平凡得很。已做的事少可记述,想做的事还未做完。大体说来,迄今为止,“已做的事”和“想做的事”都可以集中在一件事上,那就是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。的确,西方史学史是我的一个精神家园,在那里,我有一种安身立命、有所归属的亲切感,从中寻找到了一块赖以安顿心灵、乐不思蜀的精神沃土,于是毕生为此耕耘不已,也奋斗不已……

## 一、“江海门户通天下”

“江海门户通天下”,中央电视台在介绍江苏海门这座城市时,用了这样七个字。“江海门户通天下”,我不知道是哪位高人起的,多年前就播出过,今又再现,可见这“广告语”的生命力。它画龙点睛,生动地点明了这座位于长江出海口的城市的地理方位,也确切地反映了当今海门人立足长三角、面向全国、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与宏伟气沛。

1939年9月,我就出生在海门乡下。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,战乱不息,生灵涂炭。生逢乱世,连生存都成了问题,还说什么那蒲公英飘拂过的童年。

由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现代西方心理史学,对个人传记中的“童年经历”尤为关注,认为它是日后个人行为或人格的一种基础。在西方心理史家那里,一个人的“童年经历”对后来的影响,显然被肆意地夸大了,这自然是不对的;但

倘若忽视“童年经历”，特别是那种留下难忘的“童年记忆”，那也是不足取的。我这里要说的我幼时留下深刻记忆的一段短暂的启蒙教育，在我选择历史学作为最终志向时，曾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因而这段“童年记忆”至今还难以忘怀。

我父母虽受过一点旧式教育，但是文化程度都很低，母亲能识些字，但几乎不能写。父亲要好些，读写水平也不过小学程度。但父亲从小在祖父那里受教，对四书五经相当熟悉，尤其是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中的句子，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下来。这在我成年后，他也常常在我面前脱口而出，令我十分钦佩，让我这个名牌大学历史系出道的人感到羞愧。

父亲的“才华”得益于祖父的教诲。我的祖父张汝僖先生，是当地乡间远近闻名的“知识分子”，他开办私塾，吸引四方学童前来求学（一般贫家子弟不去远处上“洋学堂”，也上不起），于是在老家正房西头搭建了一大间草屋，祖父以其父（我的曾祖父张文云先生）之名，把这间由他执教的草庐称之为“文云堂”。从我稍稍懂事的时候起，五岁左右的时候，就在这间“文云堂”里念书，成天背诵儒家经典，给我留下印象深的是《论语》。

汝僖先生每天给幼孙讲解一段古文，在当时我幼小的心灵里，当然不知其意（我真正能知《论语》等古文之意，还要等到进复旦大学历史系贺卓君老师给我们上《历史文选课》的时候），但还要囫囵吞枣地把它背下来。我记性不差，祖父给我留下的“作业”很快地就完成了，我就“唆使”学堂里的小朋友，乘我祖父不在时，悄悄地溜出去玩，不是去抓麻雀，就是去捉蟋蟀，而那些顽皮的学生第二天往往背不出老师圈定的篇章而受到体罚（“尺罚”，打手心）。祖父知道缘由后，就给我加大“背书量”，以此不让我带头去玩。但我照样能背下来。就这样，我与祖父暗自较劲。现在回想这段童年趣事，还是蛮有劲的，而幼时背诵古书的童子功确让我终身受益。

好景不长，祖父不久因病去世，由此也结束了我的“学前教育”。这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，但因战乱，加上祖父身体素来孱弱，故辍学的日子很多，实际上只读（背）了一点点书。抗日战争结束后，已在上海立足的大舅唤我母亲去那儿闯荡。1946年冬，母亲带着时年七岁的我还有那襁褓中的妹妹，离乡别井，踏上了“十里洋场”，开始在这座远东大都市里生根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

成立后,我在上海念完了小学与中学。1959年9月,又顺利地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,在人生的道路上,翻开了新的一页,真的走上了这条“江海门户通天下”的通衢大道。

## 二、“谦虚治学,谦虚做人”

我是相信缘分的,命运注定我此生要在复旦大学遇上耿淡如先生(1898—1975),并与西方史学史结下不解之缘。不是吗?耿师竟与我是同乡。我的出生地海门县正余乡距老师家很近。我与耿师都毕业于复旦大学,之后又都终身在那里工作。也许在冥冥之中,一双无形的“上帝之手”把我们牵连在一起。

事实上,淡如先生是最早实践“江海门户通天下”的海门籍的前辈历史学家。192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复旦大学,遂在故乡海门中学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学(复旦大学中学部)任教。1929年11月至1932年5月赴美留学,入哈佛大学研究院,攻读政治历史与政治制度,获硕士学位。1932年5月学成归国后,他开始在沪上多所大学任教,而主要在母校复旦大学授课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转入历史系工作,在那里与周谷城先生共事多年,专治世界中世纪史,成就斐然,并与专治世界古代史的周先生齐名而享誉史学界。60年代初,他开始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。在迄至“文革”前的这五六年间,他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者的贡献。

当我于1959年秋进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的时候,耿师已步入花甲之年。平实而言,在上个世纪50年代,复旦大学并不像现在这样有名,但它的历史系却在国内名列前茅,足可与当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相媲美,堪称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之表征。当时的历史系,名教授云集。在中国史方面有周予同、陈守实、谭其骧、胡厚宣、马长寿、蔡尚思等;在世界史方面,有周谷城、耿淡如、王造时、陈仁炳、朱激、章巽、田汝康等,真可谓是极一时之选。刚过弱冠之年的我,既仰视他们,又从他们的教泽中得益。五年的本科学习扎扎实实,得到了一个史学工作者必备的学术素养和严格的史学训练,这为我日后从事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

不过,把我领进西方史学史这座精神家园的却是耿淡如先生。1964年9月,我考取了他的研究生,有幸成了他的“关门弟子”。也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,我在无意中竟成了中国大陆“文革”前首位经高教部获准的统一招生考试的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研究生,就此开启了我一辈子学习与研究西方史学史的人生之旅。

我在《耿淡如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》(载《史学史研究》2002年第4期)这篇文章中,从总体上(就耿师的史学理念)和具体实践上,谈及耿师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所作出的贡献,我把这种奠基性的贡献比喻为“先行者的驼铃”与“探索者的足印”。试想,一个人在找不到方向的时候,该多么渴望能听到先行者的驼铃,发现探索者的足印啊。

耿师教我读原著。耿师为我指示的“阅读原著,进行批判性研究”的准则,即便在今日也是一种值得倡导与发扬的好学风。一切从原著出发,不尚空言,唯其如此,中国的西方史学的研究才能有所长进。

耿师教我做研究。耿师认为,阅读原著是深入研究工作的前提,但不能停留于此,否则便是一般性的介绍了。在这里需要发扬独立思考的精神,这就是耿师所说的“阅读原著,进行批判性研究”后半句话的意思了。

耿师教我采良法。这里说的是研究方法。耿师常常说道,我们从事西方史学的研究工作,方向与目标看准了,还需要有开门的钥匙,这就是方法。他倡导的“标本”与“模型”研究法、史家“类型”与“作风”分析法、“习明那尔”教学法等,都堪称为我至今仍在仿效运用的“良法”。

.....

总之,作为他的学生,我从学贯中西的耿师那里,不只学到了西方史学史的专业知识,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,从中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,学会了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我之所以在耿师谢世(1975年)之后,在中国新时期“单枪匹马”前行,主要得益于此;作为他的学生,更为重要的是,我从他那里懂得了为学与为人之道。耿师生前经常对我说,要谦虚治学,更要谦虚做人:对于“治学”,需要刻苦而不是懈怠,需要认真而不是轻薄;对于“做人”,需要真诚而不是虚伪,需要宽厚而不是偏狭。耿师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永远的榜样。他的“谦虚治学,谦虚做人”的教导,更成了我毕生的格言。总之,我在学习与

研究西方史学史的道路上,把老师留给我的这份精神遗产视作一座灯塔,它时刻照亮着我的行程,照亮着我的精神家园。

### 三、从教：闸北十年

闸北区已在前几年并入静安区,渐渐为人们所淡忘,然而这个过去被沪上人家视为“下只角”的地方,却伴我度过了难忘的青少年时代。从1968年5月至1978年5月,我又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,闸北啊闸北,它于我怎能忘却。

闸北十年,一直在中教岗位上工作,前六年在新中中学任教,后四年在区教育学院供职。新中中学,历史久远,说来也巧,它建校1925年,也正是吾系诞生之时,与我有同样经历的中文系教授黄霖(现为复旦中文系资深教授、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大家),那时也一起分配到新中中学。此时,学校尚未复课,于是我们做了一点新中的校史,为此发现校图书资料室是个宝,这儿藏书宏富且具价值,如二十四史就有两套(后赠上海图书馆一套),有《四部备要》《四部丛刊》,妙哉!竟还藏有《万有文库》,这对我们两人所从事的文史专业,实在是难得的相遇了。

进校后渐悉,新中教师队伍优秀,可用“藏龙卧虎”来形容。文科师资就人才济济,如语文学科就拥有宦邦显、王心恒、沙本钧、徐大刚等名师,后又从他校调进一批教师,实力更强。我离开新中后,吾系67级学生郭天成从外校调入新中,任校长,同班同学王妙龙也从外校调入,任校科研组组长,均成绩不俗,博得了新中人的的一致好评,我想复旦历史系与新中中学还真有缘分啊!

新中六年,我带过两个班级:一个是72级,从迎新至毕业分配,上山下乡,做全了(这中间有一年多时间被《解放日报》借调);一个是76届,只带了一年,1974年就被调进区教育学院,又经四年,直至1978年离开闸北。

回想这十年的中教历程,终觉遗憾,虽则我也教学认真,也与学生们学工学农,同吃同住,风雨同舟,但时逢乱世,非不为也,乃不能也。然就我个人的人生旅程而言,意义不凡。掐指算来,十年闸北区,历史一瞬间,自此,开启了我毕生从教的半个多世纪的艰难行程。

#### 四、克丽奥之路

1978年春来早，是年5月重返复旦，重执教鞭，自此开启了四十多年的学术旅程，沿着克丽奥之路，攻艰克难，奋力前行，不觉已过朝杖之年。

传承与革新，作为一对范畴，是矛盾的对立还是包容的互动，我以为是后者。进言之，传承与革新的辩证运动，当是学术前进和繁荣的原动力。为此，我们需要传承，又要不断革新。前者是为了给史学发展以基础，后者是为了给史家的个性发挥以空间，舍此别无他途，除非你排斥创造，墨守成规。

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，我这里主要说一说我在西方史学史研究领域中已做过的工作。对此，我曾于2009年初，就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问题，接受了复旦大学历史系、新闻学院等几位同学的联合采访，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时，曾用“四个一”归纳与总结过我的工作（“已做的事”），那就是：确立一种史学理念，这里说的是从前辈那里继承他们对西方史学及其所持的基本思想；建立一个课程体系，这里说的是为本科生、硕士生到博士生所开设的课程，不是随意的，而应当是系统的和有计划的；编著一本适用的教材；形成一支教学梯队。我这里集中说一下，我于西方史学史研究方面“已做的事”，而这与上述所说的“四个一”也是紧密关联的。

这里说的“研究”，也涵盖学习。回溯起来，我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当滥觞于上个世纪60年代拜耿师时。在1966年前，那时主要是学习，我也做过耿师的“助教”，但在学习中也有“研究”，也有对西方史学的“批判性研究”。众所周知的是，经历“文革”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经历，刚起步就被中止了。待到大地重光，又得重新起步，我也是这样。

在新时期，我的重新起步还得要从开设“西方史学史”一课讲起。记得在80年代初，国内只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张芝联先生、四川大学历史系谭英华先生、华东师范大学郭圣铭先生等少数几位前辈在开设西方史学史课程。我步他们的后尘，也在1982年，为78级、79级学生开设该课，算是国内最早讲授这一课程者之一。我一边上课，一边进行研究。我个人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的：第一，从个案研究开始，这是“基础工程”。我大体是从希罗多德开始

的,一直往下延伸,几乎囊括了从古迄今的西方著名史家或流派,于是就有这种“个案研究”文章的不断发表;第二,在整体思考中求证,在上述这样研究的基础上,力图从宏观上了解与把握西方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,这就产生了下文要说到的“系列著作”;第三,从主体(西方史学)向外拓展,这就是说,要不断深化史学史研究的内涵,以不断开拓与创新西方史学史的学术研究。在这方面,个人既有理论的阐发,也有实践的工作。

其实,我并没有写作西方史学史著作的系列构想,但以下三本书却在无意中构成了一个“系列”,且都在各自的读者群中产生了广泛而又持久的回响。

以出版时间先后来看,这三本书首先是《克丽奥之路——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》,其次是《史学,文化中的文化——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》,第三本是《西方史学史》。这三者虽同是对西方史学发展进程的整体性思考,但在视角、立意和写法上又各有讲究,因此造就了不同的读者群:前者为适应社会大众的“普及版”,中者为学术研究的“经院版”,后者为高校学生的“教材版”,如此说来,它就形成了一个“系列”。

《克丽奥之路——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》,正如副题所示,它只是在西方史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,摄取若干断面,而主要是选择西方自古至今的著名历史学家与史学流派,加以重点铺陈,这些“断面”或可单独成篇,但联系起来看,或可是一本简明的西方史学史。为了稍稍改变一下历史编纂学历来那种严肃而又刻板的面孔,我不仅取了这样一个有悖于传统历史学的书名,而且在写法上,也作了一些“改革”:力求生动活泼,注意可读性,但又蕴含着浓浓的学术色彩,时刻不忘历史学所要表述的主题。这本被书评界誉为“颇具房龙《宽容》风格”的小书,之所以深受读者,尤其是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,我想与我在写作上这些“改革”有关吧。当今,如何把学术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源,以提高国民的素养,推进社会人文科学的普及化、大众化,当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时代命题,我个人将为此继续作出努力,推出普及化、大众化的西方史学史的新作。

《史学,文化中的文化——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》一书,与传统的史学史编纂模式不同,它不按纵向的时间顺序叙述,而是从西方文化背景上来考察西方史学的各种元素,意图多层次、多方面地揭示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。此书出

版(1990年)后,曾多次重印,学界引用率也相当高。后来(2003年)出了插图修订版,又获得了新一代读者的欢迎。该书初版问世后,很快也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(1992年)。在此顺便插入一点,我的书除上述之外,另有《西方史学散论》《影视史学》和《寻梦天涯》(主编)等也相继在台出版。当我于1998年首次访台时,发觉在海峡那边,我的书也得到了读者的喜爱,这使我颇感意外,令我十分愉悦。

由我主著的《西方史学史》,初版于2000年,目前已出了第四版。作为一本教材,本书先后被教育部列为“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”、普通高等教育“十五”“十一五”国家级规划教材,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,并被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为“推荐教材”。据不完全统计,四版印数已近15万册,其发行量已大体覆盖需用此类教材的全国各高等院校,得到了一届又一届的莘莘学子的热烈欢迎,学界评论此书是“教材的写作与学术研究进行完美结合的著作”(见张耕华:《一部“经院式”的西方史学史》,载《史学理论研究》2000年第3期)。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。现出的新版,无论就内容与观点等,都胜过前几版,新加盟的作者为新版带来了一股清风,为这本深受学生欢迎的教材增色。在此需要强调的一点是,这本教材,既是我个人多年来学术研究的成果,也是多年来我从事教学工作、教学相长的产物。本书除参与实际写作的我的几位弟子外,还包含了我授课的历届学生们的集体智慧,因此不管是引用还是海外非正规的版本,倘删去了“主”字,都是不妥的。

就学术著作而言,我与胞弟张广勇除合著上述《史学,文化中的文化》一书外,还有《现代西方史学》一书。在研究西方史学史的行程中,我还得到了学界同仁的鼎力支持,其学术成果的集中体现是已出版的由我主编的《世界文化史》(古代卷)、《二十世纪中外史学交流》和《史学之魂: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》等著作。

新世纪伊始,由我主编的多卷本《西方史学通史》由酝酿、起步、写作、定稿,历经十年艰辛,终于在2011年出版。本书阐述自“荷马时代”迄至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,开多卷本西方史学史编纂之先河,它的问世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作出了贡献。从《西方史学史》一卷本的编纂到《西方史学通史》多卷本的完成,我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就有了一个确实实的交

代,也就不枉为此生了。

关于个案研究、史学评论、读史札记、序跋等学术论文和文章,迄今为止已发表有 200 余篇。1995 年由台湾出版的《西方史学散论》一书,2008 年由大陆出版的《超越时空的对话:一位东方学者关于西方史学的思考》、2012 年的《克丽奥的东方形象:中国学人的西方史学观》等,这三本论著收录了我上述篇章中的主要的学术论文和文章。

众所周知的事实是,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很薄弱,我上面说的这些“已做的事”(学术论著),在很大的程度上,还停留在述评层面,至于说到独创性的研究,还不多。但这并不妨碍在这块被视为西方学者的“世袭领地”上,由中国学者自己耕耘而收割的果实。盘点我个人在这方面的学术成果,虽不敢自诩有多少“创新点”,然始终秉持着“西方史学,中国眼光”,对西方史学中的许多问题,也有一位东方学者的思考。现择其要者,略说以下三点。

### 1. 关于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

新陈代谢,亘古不变,西方史学也是这样。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把握住西方史学的流变呢?这一答案来源于西方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,蕴含于西方社会与时代的深刻变革之中。我个人以为,西方史学史经历了五次重大的历史转折,即现今被学界竞相引用的“五次转折说”:第一次转折发生在公元前 5 世纪的古希腊时代,它标志着西方史学的创立;第二次转折发生在公元 5 世纪前后,西方史学从古典史学转向基督教神学史观;第三次转折是从 14 世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,这次转向再一次把人放在历史学发展的中心地位;第四次转折发生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,西方史学从此开始了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发展阶段;第五次转折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,西方史学又面临一次“重新定向”。

### 2. 关于西方史学的开拓与创新

关于这方面的论述,个人“与时俱进”,林林总总也发表过不少,比如关于史学的范型、史学思想、史家的文化视野乃至“全球史观”等问题的学术探讨,这里就近年来本人关于拓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内涵略说一二。

一是关于中外(西)史学交流史的研究。传统的史学史研究,不管是中国史学史还是西方史学史,都只关注史学自身问题的研究,这自然是必要的。但